

# 福利意識與社會變遷：

## 福利制度的發展衝突與結構性限制

蔡明璋

福利哲學在二十世紀成爲一套引導已開發國家社會政策的大眾意識型態，其展現的過程有獨特的歷史意義。經過一百年的演變，福利哲學的涵義在實際運作時已面臨兩種對立的矛盾——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福利國家將必須在此種矛盾的對立命題中做一明確的評估，以爲未來的政策研究基礎。社會結構的變遷，尤其是大眾社會的結構分化，異質性與市場經濟的內部法則交相互動，使福利國家內部的社會凝聚力逐漸減弱。這些問題的發生意謂著設計社會福利制度的政治精英需更謹慎和嚴格，任何不當的措施都可能破壞福利哲學的最終精神——對人類生命尊嚴的肯定。

### 一、福利哲學：福利國家與資本

#### 主義經濟

福利哲學和福利國家在十九世紀末期的出現，並不是歷史的偶然，若考慮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殊條件，我們可以發現這是一種歷史的使然。

工業革命之後，歐洲的核心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裏，由於內部生產結構力的優勢性，能控制其他邊陲地區而得以繼續其資本的累積）從農業經濟轉化爲以機器生產爲主的工業經濟，在世界分工和國際階層秩序上，核心國家的工業優勢一直相當穩定，以工業資本主義爲基礎的英國，也分享了因經濟利益而獲得的政治穩定。對於半邊陲國家（法國、德國、比利時、美國），英國也供應他們所需的製造品。但這些半邊陲國家在重商主義和工業

主義的刺激之下，也開始改進生產技術，在邊陲地區推銷工業產品，和英國進行商業競爭。

此一競爭的結果，導致十九世紀殖民地的爭奪，新資源的取得意謂著新的經濟生產方式之移植，這時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國家對這些邊陲地區所供應的，不再完全是製成品，而是新的生產工具——機器，邊陲地區的生產機器化，使核心地區的工人受到工業革命以來初次的反作用力。

核心地區的工業化並不只限於工業部門，農業技術在急遽機器化的推動之下，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結果是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力湧進都市，滙合原有的工業勞工，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從未有這麼多都市普羅的地理集合。而反資本主義的大眾精神（Anti-capitalist mass spirit）也首次轉化爲組織形式，工會或社會主義黨派在無產階級集中的都市中蔓延開來（Wallerstein, 1979:30）。

但這時核心地區的資本家卻面臨了來自另一對立階級的威脅，潛在的階級衝突和革命，隨時可能使他們的執行委員會——國家——陷於崩潰。而農業生產過剩引起的危機（甚至輕工業製品也有這種現象），對整個核心地區生產結構的影響又非常直接。在重重剝削之下的勞工已不能負擔這些剩餘的消耗，提高無產階級的購買力成爲恢復經濟平衡的最有效方法。

勞工購買力的提高，對於世界經濟的立即效果是打通供需的瓶頸，舒緩日趨嚴重的階級衝突。因而在核心地區，福利哲學適時出現，自由主義的哲學家認爲是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萬靈丹。

西期門提(Simonde De Sismondi, 1723-90) , 穆勒(Gohn S. Mill, 1806-73) , 賴斯金(Gohn Ruskin, 1819-1900) , 霍伯森(Gohn Hobson, 1858-1940) 等著名的福利經濟學家, 都在十九世紀提出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檢討。西期門提在數次造訪英國之後, 發現英國人民將財富的獲取視為追求快樂的唯一方法, 而在這些經濟事實的背後, 隱含了資本主義的冷酷無情。他建議以立法程序來縮短工作時間, 以累進稅法促成財富的再分配, 他建議政府透過政治力量, 要求雇主在裁員或工人老病時, 能給予金錢補助(蔡明璋譯, 1983:15-16)。西期門提這個論調很清楚的反映出福利哲學和制度, 在當時資本主義經濟上的「功能」。在這裏我們不想一一列論上述學者的理論內涵(見蔡明璋譯, 一九八四), 我們只指出一點, 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 這些福利哲學的出現, 正是針對資本主義的潛在危機, 而適時地被資產階級和國家行政人員採納, 成為合法的制度。

一些重要的福利計畫, 如工作傷害保險、疾病和產婦保險、老年給付、失業保險、家庭津貼等, 都在十九世紀末和本世紀初, 由哲學思想而成為實際制度(蔡明璋譯, 一九八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 愈來愈多的國家採用這些福利計畫, 並成為國家施政的重點所在(徐震、林萬億, 1983:41-63)。

早期福利制度在核心國家的施行, 帶着濃厚的政治意味, 站在自由主義立場的資本家和政治精英, 企圖從福利制度的穩定效果(Stabilizing effect)中, 獲取更恒定持久的經濟秩序, 以延續資

本主義市場的運作, 俾有利於他們的資本累積, 當然, 這種分析多少是從整個福利制度的客觀效果, 去「理解」資本家的原始動機。不論是否我們能正確地理解到主觀的動機, 在福利制度的結果(意圖或是非意圖的)展現出來後, 資本家可能洞悉它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作用, 而願意透過政府的行動, 支持這種制度的延續。許多學者也都指出, 在巨視的經濟過程中, 福利制度確實是扮演著這種角色(Howard, 1969; Cutright, 1965; Romanyshyn, 1971)。

但就最近的資料研究顯示, 上述的論點尚未能有充分的證據支持(蔡明璋, 1984; Jackman, 1975), 但福利制度和經濟穩定的可能相關性, 並不因大眾對福利意識的覺醒而消失。二次大戰後, 工人的政治力量的集結與成長成爲一種社會事實, 工人本身也更了解利用工會力量集體政治行動可以得到許多以往所不能得到的權利, 包括對工資水準的要求和更抽象的權利之實現。他們在成爲既得利益團體後, 任何對福利制度的威脅都可能引起他們強烈的抗議。在「福利意識」背後的「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是他們與資本家談判時的最佳後盾, 這個情形在歐美各先進國家尤爲突出。

顯然地, 資本家需對無產階級的福利要求做某種程度的讓步, 而且他們也了解在有限的讓步之後, 他們因此而獲得的可能會更多, 包括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維持和未來的穩定, 這是資本家最後所祈求的。似乎福利制度使得無產勞工和資本家同時成爲現存經濟體系中的既得利益者, 資本主義的

生產剩餘使他們都能分享, 而且表面上的公平使勞工更牢牢地固守他們的生產地位, 福利制度所謂的再分配效果, 更使他們認爲實際所得的比應得的更多, 在福利制度之下的工人覺得, 前一世紀工人所遭遇到的困境都已明顯的改善了, 現有的經濟關係符合他們的利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也就在這種福利制度和階級利益關係中循着資本累積的法則而重複出現。

## 二、當代福利意識：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矛盾

嚴格地說, 一世紀來的福利思想發展並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做依據, 多方採借他種學說的精華(如社會主義、古典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 使得現有的概念架構顯得異常複雜, 例如 Furniss 和 Tilton (1977:28) 指出福利國家的基本價值是：平等、自由、民主、整合、安全、經濟效率。我們很容易看出這些抽象概念有來自西方啓蒙運動後所擁護的信念(平等、自由), 也有保守的浪漫主義所堅持的原則(整合), 也有自由放任主義所崇拜的精神(自由、民主、經濟效率), 而社會主義的口號幾乎囊括這些價值, 這只是就價值層面的選擇而已, 當我們將這些具有社會共識性的抽象概念付諸實行時, 更複雜的運作手續產生了——這些價值所指涉的主體爲何?

當我們討論平等時, 我們是指個人層次的平等或社會層次的平等? 若贊成前者, 那麼我們可能會

反對高學費政策，而主張政府應補助每個人發展他們的天賦潛能，使不必受貧困的阻礙；若我們相信社會層次的平等，我們會認為政府應將教育費用投資在少數天才上，因為這些人的成就會帶給社會更大的進步，而使整體社區福利成爲可能。個人層次的機會平等和社會層次的整體福利可能是相對的，而且個人權利和普遍的社會需求的運作並不會有相同的結果，有自主權力的國家有協調兩者衝突和矛盾的責任 (Marshall, 1966)。

自由的問題在福利社會更難處理，尤其是在考慮私財和公財的區分時，以私有爲基礎的市場經濟雖能充分地供應某些財貨和勞務，但對於某些公共財貨（如國防、醫療預防和保健、公共設施）非得有國家制度來供給不可。但問題是，當我們從個人收入中強迫課定額的稅以支持國家在財政上的福利開銷時，我們是否違背了福利社會的自由價值？當然，這種論調是以自由市場經濟和放任主義做爲基本考慮的 (Goodin, 1982:155)。個人主義論者相信自由意志優先於因社會控制所得到的整體自由（對公財的使用），而集體主義者則認爲個人主義論者所依恃的自由經濟市場無法完成的，正是社會所需要的。限制個人的自由，正可以提昇整個社會的自由，對個人私有財產的限制和處分，在集體主義論的觀點中，是使這些私有財產不致成爲他人自由的絆腳石，對私產的部分干涉是集體自由的基本保證。

這些來自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價值矛盾，使國家在執行福利政策時面臨進退兩難的抉擇。民主

、整合、安全和經濟效率都可能產生相似的困境，在此我們不擬一一討論。我們只想指出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所以會產生矛盾的原因是(1)基於個人或團體利益的考慮而採取不信任的態度，(2)福利制度效果的不確定性。

個人主義者基於人類爲己不爲人的天性，對於妨礙個人立即利益者採取排斥的態度，尤其是當問題的重點是在對非人的制度時，他更可能排除任何來自情境的順從性壓力 (Conforming pressure)，而採取對己有利的立場。當他面對一羣生活貧苦的無產階級時，他可能會暫時贊成集體主義的福利論調。但當他在孤立的環境投票表決某項新的福利立法時，他可能因爲缺乏情境的印象和壓力而做了負面的決定。個人主義者之不信任福利制度，有部分原因來自對整個社會的不信任，包括他經過民主選舉所選出來的國會議員或立法委員，更不用說國家指派的「陌生」高級行政官員和社會政策的設計者。集體主義所抱持的長遠目標和理想並不能吸引個人主義者的注意力，只有在目下的立即利益才能使個人主義者衷心的擁護。

而集體主義的社會普遍福利也因爲福利國家的失敗而面臨「信心危機」。社會福利學者一直無法提出一套自圓的福利理論，在實際執行政策過程，他們也常不知最終的目的爲何，可能的後果也常不是他們所能預測的。一個最初步的定論可能是維持現有社會和經濟的穩定和持續運作。但他們也不能決定現存經濟體系的真正受益者是誰，表面上似乎是各階層份子共享福利社會的成果，但這又落入保

守主義的陷阱，否認有另一種「福利」制度可帶給人類更多的幸福，更能符合福利的價值內涵，在福利制度的真正效果不能確定時，集體主義者在理論和方法上又遭到個人主義的排斥和懷疑。當前福利制度價值和哲學的矛盾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顯得更難處理。

也許福利制度並不能達到集體主義者所追求的結果，但就最後的總利益而言，也不會造成個人主義者的損失，不過，這只是一些推斷。另一種極端的情況是福利制度根本和這些信念毫不相干。若我們再進一步從意識型態的主觀和客觀層面的意義做一種「現象學」式的解析，我們會發現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外，另有第三度「意義空間」存在。亦即當我們在建構福利制度的價值時（例如前述的自由、平等、安全……），是我們站在社會科學家的立場上解釋時，我們是用我們自認爲客觀的二度建構 (Constructs of the second degree) 去理解我們想像的社會實在，但我們若用 Alfred Schutz 的一度建構 (Constructs of the first degree) 去解釋當事者——社會福利的受益者——如何解釋社會福利時，我們可能得到一套完全不同的見解和主觀詮釋。要真正了解社會福利的價值和對日常生活效果，我們必須更深入地去探討一般人（尤其是「案主」）如何解釋這一套社會行動，否則我們將只是在象牙塔中建構知識的異想者。

### 三、大眾社會與福利制度：限制

#### 與危機

在處理社會福利價值哲學的運作化問題時，福利理論家都建構了一個或多或少的功能失衡社會（Functional disequilibrium society），希望能用社會安全或福利計畫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部的暫時失調及恢復原來的功能整合。例如詹火生（1981:96）就指出：「社會福利的目標……是在解決個人或家庭所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協助個人重新整合到社會環境。」E. Wickenden（引自 Romanyshyn, 1971:3）認為社會福利「包括法律、計畫、利益和服務，保證或擴大所提供的一切事務，以滿足大眾公認為能使社會秩序運作地更完善的社會需求。」Romanyshyn（1971:3）自己也指出：「社會福利的功能是維持社會體系，使它能夠適應變動不居的社會實況。」似乎學者在設定這些社會結構模式時，都認為在一整體中的部分失調是可以恢復的，社會福利的效果即是使解組中的社會再度整合，或使功能整合的社會免於解組，而把最後的原因歸結到福利制度對社會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供給的作用。

這種有機論和功能論在近代社會中遭到嚴厲的批判（Giddens, 1977; Goode, 1973; Bettomore, 1974），在這裏我們想單就功能論的一個重要假設——部分的關聯性——來批判福利制度和福利哲學在功能預設上的不當。功能論認為社會體系最普遍和基本的特質是部分的互賴性，而這種部分的互賴性並非隨機的，而是一種秩序，能夠形成一種自圓的體系，任何一部分的變動都會決定其他部分的變動，整個體系就是在這種動態平衡過程中循環（

Parsons, 1951）。把福利制度運作納入這個架構在社會福利學者的論點中並非少見，從他們對福利效果的期許，隱然可見一種功能有機論一度成為他們意念建構中的優勢參考架構，最常見的論點如「社會福利能滿足大眾需求，維持秩序的平衡運作」，「社會福利將個人重新整合到社會環境中」。當我們更深入考慮當代社會結構的特質時，我們應謹慎地思索這種福利功能論調是否和實際的社會事實相應。對真實社會的結構特徵做一番徹底的了解，可避免盲目的採取福利功能論的效應假設。

社會學家在檢討福利價值和福利哲學不能有效的運作化時，他們都將失敗的理由歸因於行政設計上的錯誤，因而近來談論社會福利的學者也偏重在行政和組織的規劃與設計（郭振昌，一九八二；林萬億，一九八三），這種觀點強調行政組織內部的運作，雖然也顧慮到福利推行方案對整個社會的實質效果，但對社會的結構性質是否與行政計畫所假想的「社會模型」相符合，乃是問題瓶頸所在，而且也應是福利專家應更進一步深思熟慮的重大課題。

資本主義社會的互視社會學分析，常不是福利行政實務的研究者所關心的重點。因此，在這裏有必要對當代社會結構變遷型態作一簡明的解析。我們可以從社區解組這個事實談起。涂爾幹指出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愈來愈傾向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即社會整體的分化，使各人間的特質差異有擴大的趨勢，分工和特殊化（Specialization）的過程，雖然使社會在功能上達到整合，但在社區關係或情感連結上逐漸有分離、孤立

的趨勢（Durkheim, 1933），亦即涂爾幹所強調的集體意識的社會控制功能，在現代社會中已經不如以往那麼強而有效了。這個原因要歸於人口的增加。

人口過度成長的結構效果是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整個社會的重心移向集體（Collectivity）而遠離個人（Individual），強調量的文明（Quantitative Civilization）而貶抑質的文明（Ropke, 1960）。在大眾社會（Mass Society）中個人的特質、靈魂、價值和人格湮沒不彰，僅保有在生產功能上的特殊性，但這種特殊性卻是單調的、普遍存在的，同一工廠生產線上的勞工都有這種功能「特殊性」，在做為特殊的人格元素上，這種「普遍的特殊性」是不具意義的。社會結構的解組，在個人的生命中產生了深遠的劇變，在大眾社會中獨立而不能自主。真實的社區崩潰後，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社會」，在這種不講私情的集體裏，個人是無根的，過去支持個人，也是個人所建構成的非正式社會脈絡，已被機械性、沒有感情的正式組織取代。個人的行動、決策和責任萎縮了，而集體計畫的影響力卻相對的增強。整個生活被單調化、齊一化了，而與大眾社會生活的理想模型更緊密的契合，在所謂的「國家化」、「社會化」的過程中，大眾社會的特質更具突顯。

這整個個體標準化、齊一化的過程，意謂著社會結構的轉型，大眾化（Massification）使舊有的低階層結構趨於消散，近乎一個沒有等級的次社會團體（Giner, 1976: 127-132），整個社會結

構中的權力的組合呈現二極化的傾向，在頂端的是政治精英和政府高級行政管理及決策人員，在下層的是如散沙的大眾，中間空無一物，即缺乏強有力的「中間團體」來為大眾的真正福利辯護。冷漠的大眾當在權力精英的操縱之下，無法超越單調的例行生活方式，而社會有走向集權主義的傾向（Swingewood, 1977: 12）。

大眾化成為現代化社會的結構特質和社會福利哲學及價值是相互矛盾的，當我們想透過福利制度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福利哲學時，我們的社會卻一直是趨向非人化、集體化和權力不均分配。大眾社會裏的孤立與不能自主並非福利哲學中自由的本意，平等和民主也在冷漠的大眾中喪失。福利制度所給予個人在物質上的安全似乎不能完全彌補個人在精神上的疏離感和孤獨，社會整合在集體化的大眾社會結構中也成為幻象。顯然地，若社會福利制度能挽回社會大眾化的趨勢，那麼以行之有年所產生的福利效果而言，應該是早將福利哲學和價值實現了。但隨著福利制度的擴大，這些大眾化的現象並未曾稍減，反而更趨明顯與僵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離愈來愈遠就是一個佐證。顯然福利哲學所標榜的價值與理想未能充分實現。

在這裏我們想指出的是，在這麼一個社會結構趨勢之下，社會福利的效果是很難達到的，尤其是前述的整合功能。或者說，在這種情境下，現有的福利制度和實施方法並不能達成其在哲學上的目的，甚至是社會結構的大眾化反過來成為福利制度的限制。在此種缺乏社區基礎的解組（情緒性的而非

經濟功能性的）社會裏，我們可以預期，社會福利的效果將大打折扣。福利制度的受惠者，可能就是利用社會福利制度維持生活的人，他不必辛苦工作，領救濟金或失業保險也可過著頗為「體面」的生活。他對社會沒有責任，將自己生活情況的困頓歸因於社會的不公平或他人操弄的結果。在與社會其他人沒有社區性連帶或情緒凝結的狀況之下，是很容易走上自利主義的，而所謂的福利哲學和價值體系對他們是無意義的。大眾社會的趨勢和福利哲學的矛盾構成了福利制度在實際運作上的限制，政策的決定者若不能洞悉這種內蘊性的矛盾，則大部分的努力會產生事倍功半的結果。

當大眾社會的結構特質轉嫁到經濟過程時，所帶來的就是當代福利國家所面臨的財政危機。如果依照福利哲學的理想目標而言，經濟效率應是福利制度所引領企盼的特殊效果。但事實上，濫用社會福利經費使得歐洲福利國家的人民喪失其經濟責任。Herbert Spencer 和 William G. Sumner 認為自由市場的運作能鼓舞舞人的資產階級精神：獨立奮鬥、累積財富；而福利國家對自由市場運作的法則有相當程度的人為干預。市場法則的破壞亦即意謂一種類似「資本主義精神」的消失，福利制度使人依賴的可能性也一直是學者爭辯的問題（Goo din, 1982: 165）。工作誘因在大眾中消失，國家生產和稅收減少，財政危機便接踵而至（Sleeman, 1973: 125-130; Newsweek, 1983; Edwards, 1978）。

自然這種論調有相當濃厚的資本主義味道（

Ropke, 1960: 98），這種意謂指的並非政治層面的權力或支配，而是指涉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一套價值體系。用 Welser 的觀念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理性的工作方式，精打細算，小心謹慎，追求最大的效率，以達到資本累積的目的。在市場經濟中，若同時有政治和社會平等（包括權力、教育和機會），這種資產階級的特殊性可能擴散，轉化成社會大眾的普遍性。我們企求的社會是個人努力和負責、獨立與力爭上游的勇氣，以及自我肯定和自我實現。透過合理有效的社會和經濟計畫，福利哲學和價值在制度性的支持之下，應是可以成真的。但是當大眾社會的機會不平等，政治權力分配不均仍然存在時，福利制度可能會某種程度的毀損其哲學價值，反而為本身招徠「福利危機」。

福利制度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制度設計及實際行政得當與否（我們仍然承認這是整個福利制度中重要的一環），根本問題是在現存的社會結構與形式上：大眾社會的結構限制使福利哲學的精神在現有的福利制度中無法彰顯。我們談福利，須將大眾社會結構納入考慮，才能了解福利制度的外衍性限制和危機。

#### 四、結 論

在本文中我們想指出的是整個福利哲學與制度兩者和大眾社會結構是有所衝突的，雖然福利價值哲學行之有年，大眾社會的冷漠、疏離依舊存在。福利制度非但不能達到它所標榜的哲學價值，反而有使現行社會經濟體系——尤其是資本體系——穩

定平衡的作用。在大眾社會裏，集體主義的價值也無法與外在的結構契合，反而是兩者的矛盾導致個人主義者的抗議。事實上，個人主義者的普遍存在證明大眾社會的特質已相當突顯。

臺灣經過三十幾年來的快速發展，在經濟上的成就無人能加以否認。但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的同時，卻多多少少以社區解組作為經濟成長的代價。隨著人口的快速增加，都市裏舊社區或社會網絡多遭到破壞，而鄉村人口外流和日漸都市化的過程已開始使舊有的社區關係產生頗為嚴重的動搖。雖然社會經濟未發展到某程度時，無法支持福利制度所需的經費（蔡明璋，1984，1985），不過經濟發展愈快帶來的社會問題也愈多，對福利制度的需要也愈殷。

因此臺灣福利制度的低度發展並非是主要的癥結，福利行政根本問題也不全在規劃或設計的完善程度，這些制度上的預期效果大部分取決於「外在的」社會結構所展現出來的特性，可能使現有的社會服務（直接抑或間接的）的施行方法窒礙難行，未能發揮應有的效果。福利經費的多寡並不能預測其可能的效果大小，反而是一套能適應大眾社會性格的社會福利制度和社會工作方法才是最要緊的。當個人對社會的疏離感和無力感達到極致時，再多的福利經費都無法挽回此一解組的狀態。只有試圖藉著福利制度重建社區時，才能保有福利哲學和價值的最終人文精神。因此我們對當前福利工作方法期待的待不只是增加福利經費，而是同時進行更重要的工作——探究臺灣當前社會結構特徵對福利制度

上圖：臺南市八德社區舉辦青少年音樂營及婦女手藝班活動  
下圖：嘉義縣社區長壽俱樂部福祿壽婚典大會場



效果的可能限制，以期能找出最佳的行政策略。

（作者畢業於臺大社會學研究所）

參考資料

林萬億（1983）「社會福利計畫模型分析及其運用

」，中國社會學刊，第七期，頁二三五—二

五〇。

- 徐震、林萬億(1983)當代社會工作。臺北：五南。
- 郭振昌(1982)「社會福利政策的決策模型」，社區發展，十七號，頁四五一—五一。
- 蔡明璋(1984)「經濟成長、政治民主與福利發展：跨國的實證分析」，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第六期，頁八一—九八。
- (1985)「社會福利與平等：跨國指標的分析」，社區發展，二十九號，頁十三—十九。
- 蔡明璋譯(1982)「當代福利國家分析：人文主義的觀點」，社會建設，四八號，頁九—二一。
- (1983)「福利經濟史分析：人文主義的觀點」，社會建設，四九號，頁一三—二一。
- Bottomore, Tom  
1974 *Sociology as Social Criticis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utright, Philip  
1965 "Political Struc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Programm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537-550.
- Durkheim, Emile  
1933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Glencoe: Free Press.
- Edwards, Richard C.  
1978 "Who Fares well in the Welfare State?" in R. C. Edwards, M. Reich and T. E. Weisskopf (eds), *The Capitalist System*. Pp. 307-315, N. J.: Prentice-Hall.
- Furniss, Norman and Timothy Tilton  
1977 *The Case for the Welfare State: From Social Security to Social Equalit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77 *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Hutchinson.
- Giner, Salvador  
1076 *Mass Society*.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 Goode, William J.  
1973 "Functionalism: The Empty Castle" in *Explanations in Social Theory*, Pp. 64-9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odin, Robert E.  
1982 "Freedom and the Welfare Stat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1(2): 149-76.
- Howard, Donald S.  
1969 *Social Welfare: Values, Means and Ends*. N. Y.: Random House.
- Jackman, R.  
1975 *Politics and Social Equal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Marshall, T. H.  
1966 "Social Selection in the Welfare State" in Bendix and Lipset(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pp. 640-648. N. Y.: Free Press.
- Newsweek, July 25, 1983, pp. 8-14.
- Parsons, Talcott et al  
1951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manshyn, John M.  
1971 *Social Welfare: Charity to Justice*. N. Y.: Random House.
- Ropke, Wilhelm  
1960 *A Human Economy: 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Free Market*. Chicago: Henry Regnery.
- Sleeman, J. F.  
1973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Swingewood, Alan  
1977 *The Myth of Mass Culture*. N. J.: Humanities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